

主编 李学勤

国际汉学漫步

(上 卷)

- ☐ 费正清与中国学
- ☐ 卡内基与汉学研究
- ☐ 顾颉刚与近代学术
- ☐ 韩愈与明道公学
- ☐ 艾兰的汉学研究及其方法论概述
- ☐ 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 ☐ 侯思岳与汉魏文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 李学勤

撰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士花 王志平 王震中 刘国忠

刘学顺 邢文 张国刚 张国华

张海燕 萧立 侯旦岸 徐世虹

程英姿 彭迎喜 韩健平

国际汉学漫步

(上、下卷)

主编 李学勤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8 印张 624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6.00 元

ISBN 7-5434-2911-X/G · 235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主编 李学勤

国际汉学漫步

(下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序

《国际汉学漫步》这部书，是对外国现代一部分著名汉学家及其学术成果的论述评介。参加执笔的各位学者都熟悉国际汉学，其间不少位曾在外国任教或留学。他们或与有关汉学家有较多交往，或对所论汉学作品有较深研究，因此书中介绍绝非泛泛之谈。

关于国际汉学，还有必要在这里说明几句。“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些学者主张把 Sinology 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

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 Sinology 的语根 Sino-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这是希望读者注意的。

国际汉学兴起于十六七世纪，到现代已成为一门羽毛丰满的学科。各国主要的高等学府，一般都设有汉学系科或者研究中心，每年出现的汉学论著真是不能缕数。由于有关的作品很多，需要有及时的评论作为读者的导引，很多学报辟有这样的专栏。近年又有专门的汉学书评刊物，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主编的《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创刊于1994年春季。这充分表明汉学的发达。

和其他学科一样，汉学的学科发展也是越分越细，论著的专门性越来越强。早期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多作综合的、概观的研究，后来则逐渐深入到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而且特别强调专题的探讨。结果是汉学家日益专门化了，他们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也趋向于彼此对口，即研究中国某一领域、某一题目的学者，专与中国同样范围的同行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往来。这样，中国学者大多只了解自己学术领域内外国汉学家的成果，对于各国汉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却不容易有概括的认识。

我曾经说过，作为中国人去看外国的汉学，不仅要知道汉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应当研究汉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国际汉学研究也就是汉学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最好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汉学的发展演变放在各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只有这样做，才可能正确评估汉学各种流派的意义和特点。

可惜的是，汉学史的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尽管

各国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经过，有若干学者写过分别的综合论述，对某些国家汉学的状况，也有不少很好的介绍讨论，然而系统的汉学史著作仍然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这方面先驱作品的，如日本石田幹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出版于1932年，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的起源》出版于1933年，石田幹之助的《欧美的中国研究》出版于1942年。我国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则是在1949年问世的，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

石田幹之助等的著作，较多篇幅用以探讨汉学在西方的起源，以及其早期嬗变的历程。这方面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不少费解的问题，自然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学术界来说，迫切需要了解的，乃是现代国际汉学的状况和趋向。由于语言障碍等等原因，中国学者对国际汉学界的认识还很有限，有些学者曾经出访，所能接触的也不一定够多，所以我们的国际汉学研究，应该把较多精力放在现代汉学家及其成果方面。《国际汉学漫步》这部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想法设计的。

汉学的范围十分广阔，现代的汉学家更是林林总总，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不过是导引大家在汉学繁盛的园林中作一番漫步而已。其所以想到这样一个书名，是受了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多年的杨联陞先生著作的启迪。杨先生有一本著名的论文集，题为 *Excursion in Sinology*^①，以往我曾读过，颇多获益。后来在哈佛得见杨先生，也以有关问题讨论。今仿其意，不知是否有当。

^① 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联陞论文集》周一良先生序中提到的《汉学散策》。

《国际汉学漫步》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的第二种。专刊第一种为《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6月出版。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这部书编写和印行中所给予的关切和帮助。

李学勤

1996年8月21日

目 录

上 册

序	李学勤[1]
费正清与中国学	侯旦岸[1]
吉德炜与甲骨学研究	刘学顺[83]
韩禄伯与古代哲学	邢 文[128]
韩南与明清文学	萧 立[165]
艾兰的汉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特色	张海燕[271]
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志平[315]
侯思孟与汉魏文学	王志平[424]

下 册

瓦西里耶夫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彭迎喜[493]
查瓦茨卡娅与中国绘画美学	程英姿[521]
伊藤道治与古史研究	王震中[573]

大庭脩的学术道路及其汉学研究	徐世虹[639]
山田庆儿与古代针灸医学史研究	韩健平[733]
中村璋八汉学研究评述	刘国忠[762]
沟口雄三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王士花[807]
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	张国刚[838]
“我的中国文化梦” ——加拿大汉学家白光华自述	张国华[866]
后记	[884]

费正清与中国学

· 侯且岸 ·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公认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全面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理路,必须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做一深入、系统的探究。

一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集中于传统汉学研究。汉学(Sinology)也称做中国学,它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①。随着新航路的发现,中西之间的交通愈加便利。自 16 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遂形成了一股传教热。尽管这种宗教活动是同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

^① 在此之前,在欧洲重商主义浪潮的推动下,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有一些商人和游历者来华,曾经写过一些“游记”和“通商指南”之类的介绍中国的书,这些书从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欧洲汉学研究的端绪。

的掠夺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与此前唐代景教和元代基督教罗马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有所不同。这次传教不仅促进了西学传入中国,而且增进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使得他们初步建立起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教士垄断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这种状况直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汉学研究开始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开先河者也是传教士,但他们起步很晚。直到19世纪30年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进入中国,尝试汉学研究。然而,如果说欧洲的汉学研究的兴起还多少包含有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的兴起就完全是出于对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欧洲,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这又使得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研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 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①。美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汉学著作同欧洲早期耶稣教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相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而后者不论是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洲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585年,法文本出

① [日]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道教》第三卷,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版于 1588 年)和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1848 年出版)两本书中窥见其不同的学术路径的端倪。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着眼,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而美国的早期汉学研究已经超出了人文科学范畴,带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

相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美国的汉学研究确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由于时代的关系,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同美国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掠夺、扩张和文化渗透,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是不同的。费正清在回顾美国的汉学史时曾经说过: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①。在我看来,这种“使命感”就体现为东方学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这当然是欧洲传统汉学所不具备的特点。

美国的汉学研究属于东方学范畴,它的起步也是和“福音传道”联系在一起的。1830 年,美国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派出新教传教士来华。新教传教士进入

^① [美]费正清:《70 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9 页。为了与西方列强争夺东方,开展对东方的研究,1842 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的、独立的、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机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该学会以“传布关于东方的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为宗旨,开展对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的古代文化、历史、语言、地理的学术研究活动。1851 年,正式创办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OS)(季刊)。

中国以后,一方面进行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也开始研究中国。然而,由于他们是以“武器和贸易力量为后盾的”,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①。就使得他们“在形式上与 16 世纪末期利玛窦遇到的情况大为不同:当时耶稣会会士避开了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而依附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 19 世纪初期的传教士却得到中国港口的外国商人的支持,并在普通的中国百姓和下层文人中,而不是在统治阶层中寻找教徒。耶稣会会士通过温文尔雅的谈话传播福音,而早期的新教传教士由于在 1842 年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被禁止布道,只好求助于文字材料”^②。“和巴黎、莱顿或剑桥最终成为中国通的那些汉学家不同,早期的传教士是在没有图书馆甚至实际上没有词典的情况下开始传教工作的”^③。这样,他们无论是传教,还是研究汉学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美国的早期新教传教士曾经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1848 年,卫三畏发表了《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一书^④。这本书比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鲁德照的《中华帝国志》晚了 200 多年,而且三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有所不同。卫三畏的书试图把中国做为一个整体文明来研究,已经带有一些跨学科学研究性质。因此,费正清称卫三畏的书“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⑤。类似的著作还有卢公明(Doolittle, Justus)的《中

①②③ [美]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1 页。

④ 美国早期汉学家往往是有多重身份。有的汉学家既是传教士,又是外交官。卫三畏就是典型一例。他初为传教士,后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晚年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学。

⑤ [美]费正清:《70 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1 页。

国人的社会生活》、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明恩溥(Smith, Arthur Henderson)的《中国的特色》。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等做了描述和概括。与欧洲的传统汉学不同，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在内容上偏重对中国做总体论的介绍，涉及的面很广，远远超出了古典文化范围。从他们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像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赞美，也看不到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对中国较为真实的介绍。人们所看到的是在外部冲击下每况愈下的、落后的中国。他们鄙视中国的落后，试图以西方为范例来改造中国。正如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在分析明恩溥的《中国特色》一书时所指出的那样，“早期传教士的主要传教目标使他们对产生了一成不变的看法；明恩溥来华的时间较晚，并且来自具有新的自我意识的美国，他曾考虑把社会进步和近代化也做为传教的目标。他的书从这个新角度描述了中国，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匮乏”^①。早期传教士研究中国的这个新角度——近代化，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于在百年以后的今天，这种研究取向还在现代中国学领域中有较大的市场。恐怕也正是这种以西方、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将美国人的思维偏向引向极端，导致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也就使得传统汉学在美国难于扎根，“在这个专业性中国学领域中，美国落后于欧洲”^②。

19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陆续设立了汉学

① 转引自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2 页。

② 同上书，第 400 页。

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在美国首先开设汉语课程,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考古室和东方学图书馆。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且设立东方图书馆。美国的汉学研究从草创时期开始步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图书馆。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

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成立于1919年。校长为美国教育家、外交家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为了使燕大能够获得迅速发展,司徒雷登主张,必须使燕大更加“中国化”,同时还要以燕大为基地,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努力把燕大建设成为一所“国际性”高等学校。他认为,“新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①新大学要以沟通中西方化为宗旨,“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②。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推动下,燕大和哈佛联姻,创办了“哈佛燕京学社”。该学社成立于1928年,本部设在哈佛大学。1928年1月4日,本部在哈佛正式组成,确定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的“艺术、考古、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史”,设立基金和独立的出版机构。是年2月10日,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也宣告成立,著名中国学者陈垣担任主任。学社设有五人组成

^①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54, P. 71.

^② [美]司徒雷登:《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9月24日。

的教授会(Faculty)进行学术指导,其中代表哈佛方面的是法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叶理绥(Serge Elisseff)。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还设立了行政管理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或称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内设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负责实际工作。

哈佛燕京学社为推动美国和中国国内的汉学研究,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贡献之一,受哈佛燕京学社派遣来华学习、研究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学成归国以后成为汉学和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其中的代表。贡献之二,该学社培养出一批能够运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中国新一代学者。如: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杨联陞等。贡献之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该学社继续为发展美国的中国学培养新一代研究者。但是,侧重点有所变化,从中国古代文化转向与地区研究相联系的当代、近现代中国问题。贡献之四,该学社出版古籍,编纂工具书,扩建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的汉和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大幅度增加,使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心。

需要特别指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的成立^①。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

^① 对这个学术团体,中文译法很不规范,有好几种译法,如译做“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本文采用“太平洋学会”的译法。

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

太平洋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商界、教育界、宗教界人士发起的区域性团体,其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在财政上受到糖业种植园主的资助,后来经过扩充,吸收了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迁至纽约。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洲、菲律宾、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等国均设有分会。总会有会刊《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美国分会有会刊《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

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的远东局势的关注,太平洋学会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远东问题研究,同时兼顾整个亚洲研究。在美国高等院校还尚未设立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之前,它是美国“对于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独立研究的最重要的唯一来源”^①。它的主要长期研究规划几乎涉及到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各方面问题,例如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和投资问题,等等。太平洋学会着力培养亚洲研究专家,很重视语言训练。但学会的规划也同时明确

^① [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德·菲尔德著:《从右到左:我的自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